

曹操对孔孟思想的扬弃

陈瑞

(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媒系, 贵州 贵阳 550014)

摘要:曹操活跃于汉末建安时期。是时天下礼崩乐坏,分裂割据,纷争动乱。曹操身为那一特殊时期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曾一度掌控朝政大权,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其一生功过是非众说纷纭,或为治国之能臣,或为乱世之枭雄,不可一概而论。他外定武功,内修文学,其权利行使方式及个人思想在其文学作品中有充分的展示。其仁爱与礼义的思想行为,有关教育和人才观点,鬼神和天命思想,都体现出了对孔孟思想的扬弃。

关键词:曹操;孔孟;扬弃

分类号:K236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18)05-0104-03

曹操以自己的智慧才能与权术谋略,于汉献帝时官至丞相,封魏王,一度掌控了东汉朝政大权,挟天子以令诸侯,在外定武功的同时又内修文学,为建安文学的繁荣,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他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,又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,在仁爱与礼义、教育和人才、鬼神和天命等思想上,都表现出了对传统孔孟思想的扬弃。

一、仁爱与礼义

孔孟之仁爱、礼义思想传承千年不衰,被视为孔孟思想的核心。“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‘仁’与‘礼’。所谓‘礼’,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,所谓‘仁’,不仅指主观的道德修养,也指客观的伦理教化。”^[1](P86)]《论语·颜渊》曰:“克己复礼为仁。”^[2](P131)]孔子要求君子以义为上,以符合仁与礼的要求。孟子讲仁义,并进一步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曰:“人皆有所不忍,达之于其所忍,仁也。人皆有所不为,达之于其所为,义也。”^[2](372)]“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”^[2](P238)]。在孟子看来,人只有具备了仁和义,才成其为人,才能够安身立命,只有遵天理而动,才能恪守礼制,为国之忠臣良将。孟子之“仁”“义”是人的内在品质,是有所为有所不为

的人生准则。

汉末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,孔孟思想虽受到一定的挑战,但仍深入人心。曹操能够取得相王之尊的地位,必然不可能抛弃孔孟的仁爱礼义思想,而其则深刻地体现在其行为处事及文学作品中。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记载:“冀州刺史王芬、南阳许攸、沛国周旌等连接豪杰,谋废灵帝,立合肥侯,以告太祖,太祖拒之。”^[3](P5)]为此,曹操写下了《拒王芬辞》,认为“夫废立之事,天下之至不祥也”^[4](P58)],并提出警告,劝“诸侯自度”,不要重蹈七国之覆辙,坚守君臣之礼。面对“贼臣执国柄,杀主灭宇京。荡覆帝基业,宗庙以燔丧”^[4](P3)]的国家灾难,曹操毁家纾难,广散家财,聚集义兵,意图诛杀贼人董卓,保卫汉室,维护礼制所规定的秩序和规范。又,“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,太祖拒之”,作《答袁绍》曰“诸君北面,我自西向”^[4](P64)],以表忠于朝廷之心志,心系天下安稳,遵循儒家传统的礼义观念,恪守儒家道德规范。他的礼义信念还表现为对遵守礼义的古人的推慕。《短歌行·周西伯昌》仰慕周文王于“三分天下有其二。修奉贡献,臣节不坠”^[4](P5)]的圣德,《善哉行·古公亶甫》推许立德垂仁之举,坚持为臣之操守。处于“铠甲生虮虱,万姓以死亡。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”^[4](P4)]的战乱时代,曹

收稿日期:2018-05-10

基金项目: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教师教学科研项目(QSJS2018)

作者简介:陈瑞(1985—),女,山东成武人,讲师,硕士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。

操悲愤断肠。其内心情感的不自禁流露,其悲凄与断肠之痛,正出于其内心的不忍,即“恻隐之心”的流露,也是其仁之所在。“其举义兵以来,将士绝无后者,求其亲戚以后之,授土田,官给耕牛,置学师以教之。为存者立庙,使祀其先人”^{[3](P28)},极具人文关怀。战争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破坏,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,曹操以一己之力所能达成的,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利,举义兵以讨贼,行义举以爱人,安抚生者,抚慰百姓,予灾难中的百姓以关怀。这正是其仁爱之所施,民心之所向。曹操除遵礼尚仁之外,还常常体现出重义的一面。《报蒯越书》表达其不负蒯越所托,尽心照管其家人之义。《分租与诸将掾属令》“追思蒯婴散金之义”而“酬答众劳,不擅大惠”,^{[4](P37)}可谓大义。对从军死亡不归者之家室,曹操下令,凡“无基业不能自存者,县官勿绝廩,长吏存恤抚循”^{[4](P40)},以此告慰死者,勉励生者。曹操之义,正是孟子内在修养之义所表现出的一种外在的与人为善,与人以惠的义气。

但曹操终其一生,杀伐决断中又颇多违礼背仁不义之举。其少时“飞鹰走狗,游荡无度”^{[3](P2)},佯装中风而使叔父见疑于父亲,因无人管束而更加肆无忌惮。曹操于建安元年迎立汉帝,其后封魏公、魏王。“在实际权力方面汉帝只是曹操手里的一个傀儡,国家大权,刑罚庆赏,实际都掌握在曹操手里。”^{[5](P66)}其以天下社稷功臣自居,野心勃勃,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觊觎汉室,已然不见君臣之道,虽有答袁绍、拒王芬、让九锡等辞让忠义之举,但其或为招揽人心、制造舆论、静待时机之谋略。《诛袁谭令》曰“敢哭者,戮及妻子”^{[4](P33)},可谓严酷。其推行严刑峻法,《败军抵罪令》《军令》等明确军纪惩罚,严酷之处,一方面当为征战所需,一方面则为仁义缺失。其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,曾为争权夺利而采用残酷的手段,滥杀无辜,制造了深重的灾难。徐州之战中其屠杀徐州百姓数十万人,官渡之战中其坑杀袁绍部下数万降卒。“在‘围而后降者不赦’的条文实施过程中,不知道有多少繁华的城市遭到了惨烈的破坏,无数的无辜平民遭到残酷的屠戮。”^{[5](P69)}如此种种,已然完全不见仁爱的踪影了。

曹操在仁爱礼义方面所体现出的对孔孟思想的扬弃,是由其本性和智慧所决定的,也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,旨在获得军心、民心以助其成就大业,是为了巩固政治军事利益而做出的权衡之举。其虽在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上时有偏差,但仍然有利于曹魏集团势力的扩大和巩固。

二、教育与用人

孔子教弟子以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,使弟子能够“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,行有余力则以文学”^{[2](P49)}。孝悌、谨信、仁爱都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。对于诸侯争霸、礼崩乐坏、“八佾舞于庭”^{[2](P61)}的残酷的社会现实及由此而生发的僭越行为,孔子希望通过道德教育以提升世人的道德修养,进而使风俗淳厚,以复兴周道。孟子则主张“谨庠序之教,申之以孝悌之义”^{[2](P204)},寄希望于通过兴办学校,推广教育,以实现“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”^{[2](P204)}的理想社会。孔孟都重视教育对人的思想及社会教化的作用和意义。孔孟教育思想在曹操文学作品中也有充分的体现。其《修学令》对社会战乱所带来的仁义礼让之风的衰退与消亡深感心痛,“其令郡国各修文学,县满五百户置校官,选其乡之俊造而后教学之,庶几先王之道不废,而有以益于天下”^{[4](P32~33)}。命令办学校、兴教育来教化人民以传先王之道,可见其对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之深刻,与孔孟之重教思想一脉相承。所不同的是,孔子育人首先重视人的德行,曹操则意图通过文学以达到传先王之道的目的。其《转邳原五官长史令》要求邳原代其教育曹丕,《百辟刀令》希望把宝贵的百辟刀赠予好文学的儿子,《诸儿令》则希望其子慈孝而能善,凡此种种,均凸显其对后辈教育的思想及标准。

在人才观上,孔孟都有任人唯贤的主张。《论语·颜渊》曰:“舜有天下,选于众,举皋陶,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,选于众,举伊尹,不仁者远矣。”^{[2](P139)}《孟子·离娄上》曰:“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。”^{[2](276)}孔孟推举人才首先强调道德,以求以德治国,以德服人。曹操也重视选拔任用人才,不拘一格。其《短歌行》云:“山不厌高,水不厌深,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。”^{[4](P5)}其对有功之士的大力奖掖增封,皆出于对人才的爱护与重视。其《下荆州书》曰:“不喜得荆州,喜得蒯异度耳。”^{[4](P69)}其《诸儿令》曰:“儿虽小时见爱,而长大能善,必用之。吾非有二言也,不但不私臣吏,儿子亦不欲有所私。”^{[4](P47)}均明确表达了用人不唯亲的思想。不同于孔孟道德第一的人才观,曹操用人坚持唯才是举。《求贤令》《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论》《举贤勿拘品行论》三次求才令,均置才能于第一而次之以德行,举贤不计道德品格,甚至完全忽略道德品格。于“盗嫂受金”^{[4](P41)}“负污之名,见笑之行,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

者”^{[4](P49)}，他都希望能够得而用之，以助其成就功业。他认为“有行之士，未必能进取，进取之士，未必能有行也”^{[4](P46)}，因此反对“军吏虽有功能，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”^{[4](P32)}的论调。但是，在极度渴慕大力招揽人才的同时，曹操也大肆杀戮人才。孔融，一代“逸才宏博”之士，只因坚持“依旧制，定王畿”的理想，维护汉王室，不满曹操篡逆之谋，而被曹操加以“违反天道，败伦乱理”的罪名杀害。杨修“谦恭才博，军国多事，总知外内，事皆称意”，却终因被曹操认为“不与吾同怀”而杀之。华佗身怀绝技却“厌食事”，以至于曹操屡招而不至将其杀害。曹操对人才的重视与重用实为难得，但其唯才是举却建立在唯我是用的基础上，一旦人才不能为其所用，便会竭尽威逼利诱之能事，视之为患而必除之。崔琰、荀彧之死，毛玠之被罢黜等，皆由于此。

三、天命与鬼神

孔子不信鬼神信天命。《论语·子罕》曰：“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^{[2](P110)}朱熹认为，此“言必不能违天害己也”^{[2](P110)}。可见孔子认为天命是不可违背的，但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^{[2](P134)}，圣人君子大可不必为之忧虑。面对天命的强大和不可抗拒，孔子仍然表现出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自强不息的精神。孟子认为“莫之为而为之者，天也；莫之至而至者，命也”^{[2](P308)}。此言天命实为一也，即天命是有意志的，一切结果都是天命的安排，天命不可违，所以人要“顺受其正”，坦然接受天命。孔子不信鬼神，认为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”^{[2](P64)}，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^{[2](P125)}孔子更是着眼于现实人生，否定虚妄的鬼神，所以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^{[2](P98)}。

天命鬼神观在曹操的思想中时常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，而这种矛盾在其理智的控制下，往往能够得到和解。曹操在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中自称“性不信天命之事”^{[4](P41)}。其《春祀令》批判祭祀礼节的繁琐虚伪，直接继承了孔子“祭神如神在”的观点，不信鬼神。其《遗令》中言明自己死后的墓地要靠近西门豹祠，以表达对西门豹及其无神论思想的赞许和认同。其《善哉行》直言不讳地大声疾呼：“痛哉世人，见欺神仙。”^{[4](P219)}其《掩骼宋金生表》中向汉献帝汇报对河内神人宋金生行军法之事，“很好地表明了他不信鬼神的思想”，“破除对神仙的迷信”^[6]。但与此同

时，面对“德行不缺，变故自难常。郑康成行酒，伏地气绝；郭景图命尽于桑园”^{[4](P12)}的天命无常、生死寿夭的不可抗拒，曹操又极度渴望能够长生，因而写下了大量的游仙诗。他“驾六龙，乘风而行”，“上到天之门，来赐神之药。跪受之，敬神齐”^{[4](P1)}，“思得神药，万寿为期”^{[4](P8)}。在“天地何长久，人道居之短”^{[4](P8)}的残酷现实中，他也清醒地意识到“厥初生，造化之陶物，莫不有终期，圣贤不能免”^{[4](P2)}。人生最终都会归于死亡，这是客观规律。去日苦多，天命无法抗拒的苦闷，以及对神仙的幻想与狂热，终于使他在理智的思考中平静了下来。其《龟虽寿》认为，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身心的修养，而非完全由天命决定，通过自身的调养可以延年益寿。曹操的这种生死天命观，也正是对孟子“寿夭不贰，修身以俟”思想的直接继承。其思想深处一方面不信鬼神却向往长生，另一方面却在现实面前无法超脱。情感上的向往和追求与理智的思考和认识之间产生了冲突。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，最终在曹操这里趋于和谐；在坦然接受不可抗拒的死亡的同时，又努力修身以延年。

总之，曹操对孔孟思想既有继承也有反叛。处于“天下尚未定，未得遵古”^{[4](P57)}特殊时代的曹操，通过征伐，最终统一了北方。这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百姓生产生活。而其受到非议的举措，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所处的特殊时代和特殊的政治地位所影响。在天下大乱、生灵涂炭的时代，或许只有通过流血杀戮方可实现统一安定，孔孟思想才可能有赖以存在的环境。曹植《武帝诔》曰：“茫茫四海，我王康之。微微汉嗣，我王匡之。群桀扇动，我王服之。喁喁黎庶，我王育之。”^{[7](P325)}对曹操一生的文治武功给予了极大的肯定。曹操定天下，恩及天下黎民百姓，他本人也希望可以“恩德广及草木昆虫”^{[4](P4)}，并为此身体力行，因此对其评价不可一概而论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郭预衡.中国古代文学史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.
- [2]朱熹.四书章句集注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.
- [3]缪钺.三国志选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.
- [4]曹操.曹操集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.
- [5]王仲荣.魏晋南北朝史(上册)[M].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9.
- [6]王巍.三曹以气为本的哲学思想[J].清华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，2001(3).
- [7]张溥.三曹集[M].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2.